

漢語方言研究小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

何 耿 鏞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7995



山西人民出版社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

何耿镛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字数, 81 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书号: 9088·49 定价: 0.73 元

序

王 力

读了何耿镛同志所写的《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我很高兴。这本书材料丰富，观点正确，是一本好书。

方言学的历史是很难写的，因为中国古代关于方言的著作不多。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耿镛同志用二十余年的工夫搜集材料，其毅力是惊人的。其所搜集得的材料是很可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发展的轮廓。

这本书有两大优点。第一，在讲到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的时候，能科学地说明那些方言现象，例如耿镛同志说：古代收—n尾的字，在汉代齐鲁方言里的实际读音已失去了一n尾，所以“觶、桓、献、殷、烦”可以与“觚、和、莎、衣、夫”相通。第二，耿镛同志批评了“方言证许”。方言证许是方法上的错误，是应该批评的。

书中最后三章讲现代中国方言学的发展，也有很

大的参考价值。

1982年12月17日

写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引 言

语言是社会现象。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在纵的方面有古今的不同,在横的方面又有方言差别。而方言差别的产生,就其历史渊源来说,可以说与人类社会历史同样的漫长和古远。古代所谓“五方之民,言语异声”,^①“诸侯力征,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②就正是语言或方言分歧的反映。

我国的方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远在西汉的扬雄,就经过实际的调查,编成了一部方言比较词汇——《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但是,从扬雄以后直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间,方言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情况,有它一定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国的封建社会从秦汉到清末,延续了二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被尊奉为文化思想的正统,封建文人士大夫对于各种事物或问题的评论,也一直以正统的文化观和道德标准为尺度。这种文化观和道德标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崇奉封建文人士大夫的文学,排斥民间创作;反映在语言问题上,就是以“雅言”为贵,鄙视方言俚语,认为方言俗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清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说过这样一段话:

“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

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嘯，夫子病之；鵠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阳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座，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愔称裴献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渊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邺下人士音辞鄙漏，风操蚩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矣。”③

这段话告诉人们，方言差别古今亦然；而古代人们说话带有方音是正统文人士大夫所鄙视的。某种语言和它的方言，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人们交流思想、表达思想的工具，只是使用的人数多少和通行地域的广狭不同而已，它们之间只有异同而没有正伪，没有优劣贵贱之分。可是在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只有“雅言”才是正言，方言俚语都是语言的“谬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时虽然也注意到各地方音的不同，论及了某些方言现象，但是他们又往往站在正统韵书的立场上来指责和纠正方音的“谬失”，其目的是要使人“不为

方音所囿”，④以免“不能自拔于流俗”，⑤真正能以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办法去研究方言的实在不多。到了清朝末期，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章太炎对过去那种鄙视方言俗语的态度不以为然，并且认为方言材料“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然而他们又往往拘泥于“今之殊言不违姬汉”，“今世方言上合周汉者众”的陈腐观念，他们的所谓研究方言也只不过是“以古证今”，替古义找一些证明而已。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文化思潮的推动和现代语言学科学的发展，方言的调查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才陆续开展，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的语言学家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来调查研究方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方言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且逐渐使之发展成为语言学领域中一门新的学科。

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蓬勃开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解放以后的方言调查研究，就其规模、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本《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试图把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和叙述。但是，从隋唐至元明这一时期都没有方言研究的专著，所以书中只好用“方言记载”或“方言材料”这一类提法，把有关材料汇录在一起。虽然是材料汇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线索。

注：

①《礼记·曲礼下》

②《说文解字》序

③《日知录集释》卷29“方音”条

④劳乃宣《等韵一等外篇》“杂论”

⑤陆资《菽园杂记》卷四

目 录

王 力：序

引言

一、扬雄的《方言》	(1)
(一)《方言》的体例和内容	(2)
(二)《方言》的价值	(7)
二、散见于先秦两汉典籍中的方言材料	(10)
(一)汉代经师笺注中所透露的方音痕迹	(10)
(二)《尔雅》、《说文》、《释名》所反 映的方言现象	(13)
(1)《尔雅》所包含的方言成分	(13)
(2)《说文》中所记载的方言俗语	(14)
(3)《释名》中的方言记载	(17)
(三)散见于其他经史传注中的方言材料	(21)
三、郭璞的《尔雅》注和《方言》注	(23)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的方言记载	(28)
(一)魏晋南北朝的音韵研究和陆法言的 《切韵》	(28)
(二)颜之推论南北方音的异同	(34)
(三)隋唐时期的外国借字和汉藏对音材料	(37)
(四)隋唐时期关于汉语声调的一些资料	(40)

【五】宋代的方音材料·····	(44)
五、元明时期的方言记载·····	(49)
(一)元明时期的韵书所反映的方音特点·····	(49)
(二)明代学者笔记中的方言材料·····	(54)
六、清代的方言研究·····	(59)
(一)续补《方言》的著作·····	(60)
(二)方言俗语的辑录和考证·····	(63)
(1)“分类考词(语)”派的著作·····	(64)
(2)“分韵(类)考字”派的著作·····	(67)
(三)章太炎的《新方言》·····	(69)
(四)清代各家音韵著作中的方音材料·····	(74)
(五)西洋人的汉语方音著作·····	(81)
七、中国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	(84)
八、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方言研究(上)	
——从民间歌谣的研究到“方言调查会”的	
成立·····	(88)
(一)方言调查研究的发端·····	(88)
(二)“方言调查会”的成立·····	(89)
九、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方言研究(下)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现代汉语方言	
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	(94)
(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	
开展的社会背景和科学条件·····	(94)
(二)调查研究概况和主要著作·····	(95)
(三)古代汉语方言的研究·····	(101)
(四)三十年代拉丁化运动中所涉及的理论	

问题·····	(101)
十、近三十年的汉语方言研究概况·····	(106)
(一)从五十年代初到一九六六年	
的调查研究工作情况·····	(108)
(1) 汉语方言普查·····	(108)
(2) 普查以外的调查研究概况·····	(109)
(二)一九七六年以后的方言研究概况·····	(112)

后记

一、扬雄的《方言》

方言差别的存在至少可以说与人文历史同样的古远。远古汉语的方言情况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已给我们揭示了汉语方言分歧的一些情况。《左传·文公十三年》载：“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晋国派魏寿余诱士会归晋，因秦人的语言魏人听不懂，所以魏寿余要求秦人派能与魏军长官通话的东人过来，士会是东人，所以秦人不得不派士会前往。这说明秦人和魏人语言是不同的。《战国策·秦策》载：“周人谓鼠未腊者朴，郑人谓玉未理者朴。周人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乃死鼠也。因谢不取。”这说明周人和郑人语言不同。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当时各地方言差别的情况，但是材料都比较零散。我国真正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是从西汉的扬雄开始的。他从实际语言出发，运用客观的调查方法，记录了丰富的方言材料，编成了一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成为我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方言调查研究专著。

相传我国远在周秦时代，天子为了体察民情风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后的农暇季节派遣使臣到民间去搜集歌谣和方言异语。这些材料“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①应劭在《风俗通义》序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周秦

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未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方言》成书的具体年代不易确定，只知道它在东汉末年才普遍流行。汉末晋初的人都说是扬雄所作，如应劭的《风俗通义》和常璩的《华阳国志》都这么说。但是《汉书·艺文志》和《汉书·扬雄传》都没有提到扬雄作《方言》，因此宋朝人便以为《方言》属之扬雄，可能是出于依托。但是从上引应劭的那段话来推断，《方言》并不是一个人所作。扬雄之前，严君平和林间翁孺或者保存了一部分材料，或者拟定了调查项目；扬雄继承了前人的旨趣，加以注续。因此这部书既经过了扬雄二十七年的调查、研究和整理的辛勤努力，同时又吸收了前人的调查研究成果。

（一）《方言》的体例和内容

今本《方言》是晋郭璞的注本，凡十三卷。但是刘歆和扬雄往来的信里说是十五卷，郭璞的《方言注》序里也说是“三五之篇”，卷数和今本不同。至于字数，在应劭的《风俗通义》序里说是九千字，但据戴震的统计^②，现在郭注本有一万一千九百多字，比应劭所见的本子多出将近三千字。这些字是在什么时候增添出来的，已经无从考订。

《方言》在体例上和《尔雅》相近，把每类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或词排列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当时比较通俗的说法去加以解释，并列举了各地不同的说法。如：

悽、忸、矜、悼、怜，哀也。齐鲁之间曰矜，陈楚之间曰悼，赵魏燕代之间曰悽，自楚之北郊曰忸，秦晋之间或曰矜，或曰悼。（卷一）

逞、苦、了，快也。自山而东或曰逞，楚曰苦，秦曰了。（卷二）

膝、廛，丰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膝（或谓之廛）；丰，其通语也。赵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谓之丰人。燕记曰：丰人杼首。杼首，长首也。楚谓之忸，燕谓之杼。燕赵之间言围大谓之丰。（卷二）

所不同的是《尔雅》十九篇每篇都有篇目，《方言》不列篇目；《尔雅》着重解释“古字古言”，而《方言》则着重于当时的殊方异语。

《方言》里涉及的地域范围很广，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疑；东北至北燕，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瓠，西南至梁益蜀汉。作者要记录这样广大地域的语言，采用小的地理名称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得不采用古代的国名和区域性较大的地名。书中所记的特殊方语，是循地理的分布而表示差别的，有的通行区域狭，有的通行区域广。在语言上，有的是声音相近的转语，有的则是声音不同的同义词，综合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

（1）通语、凡通语、凡语、通名：这是没有地域性的普通话。如：

“娥、嫫，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嫫。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嫫，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姝。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卷一）“忸、媯、怜、牟，爱

也。韩郑曰𢇛，晋卫曰𢇛，汝颍之间曰𢇛，宋鲁之间曰𢇛，或曰𢇛。𢇛，通语也。”（卷一）

（2）某地某地之间通语、四方之通语、四方异语而通者：这是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如：

“覆结谓之𦐇巾，或谓承露，或谓之覆采，皆赵魏之间通语也。”（卷四）

（3）古今语、古雅之别语：这是当时实际语言中残存的古语成分。如：

“敦、丰、𡗗、介、𢇛、般、𡗗、奕、戎、京、𡗗、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𡗗，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介，或曰𢇛。宋鲁陈卫之间谓之𡗗，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𡗗，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𡗗，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卷一）

（4）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这是不同地域的方言。如：

“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卷一）

（5）转语（或语之转）、代语：这是兼包纵横两方面因声音转变而产生的词语。如：

“庸谓之𡗗，转语也。”（卷三）“𡗗者，子也。”（卷十）郭注：声之转也。

扬雄撰辑《方言》的目的，可以说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他在《答刘歆书》中说：“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

解”，在《方言》的“释古今语”一条中又说“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他的意思是说，他调查研究方言的目的，是因为古书中所存留的古词语不容易理解，想拿活的实际的语言来比较，以寻求一个相当的解释；反过来说，就是拿当时各地的方言和方言词语的含义来推求古书里相当的文字，找不出相当的文字的就采取直音的办法，或用同音假借，或另造新字，所以前人说《方言》中奇字特别多。他的材料来源，不是主观杜撰，而是利用“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到京都的机会，用“三寸弱翰，斋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的方法，经历了二十七年的调查和积累所获得的。假如当时扬雄有现代的记音工具，那么，后代就更容易了解他重视活语言的深意了；所记录的材料，就能更准确、更全面反映汉代语言面貌了。

《方言》在体例方面虽与《尔雅》近似，但它并没有受到那种体例形式的限制。我们知道，《尔雅》的体例按意义排列，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排列在一起，最后用一个当时通行的说法去加以解释。可是，在语言中意思完全相同的词是很少的，有些词意义虽大体相近，而在修辞上或用法上往往有细微的差别，《尔雅》的处理方法是只注意到同义词意义上的近似，而没有反映出同义词的修辞色彩和用法方面的不同，扬雄《方言》则非常注意同义词大同中的小异。如“𠵽、唏、杓、但，痛也。凡哀泣而不止曰𠵽，哀而不泣曰唏。于方：则楚言哀曰唏；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少儿泣而不止曰𠵽。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人少儿泣而不止谓之𠵽，哭极音绝亦谓之𠵽。平原谓啼极无声谓之𠵽，楚谓之𠵽，齐宋之间谓之𠵽。”

暗，或谓之怒。”（卷一）“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者谓之永。”（卷一）郭注：各随事而义。另外，《尔雅》的着眼点是字，而扬雄则是从实际语言出发。汉字写下来是一个个独立的符号单位，所以长期以来许多人模糊了字和词的区别，而在《方言》中则可以看到许多由两个字组成的双音词。由此可见，扬雄的着眼点不是字，而是词。如“漫台、脅阅，惧也。燕之间曰漫台，齐楚之间曰脅阅。宋卫之间凡怒而噎噎谓之脅阅。南楚江湘之间谓之啍𠵽。”（卷一）

“恒慨、蓼绥、羞绎、纷母，言既广又大也。荆扬之间凡言广大者谓之恒慨，东瓯之间谓之蓼绥，或谓之羞绎、纷母。”

（卷二）这两条中的“漫台”、“脅阅”，“啍𠵽”、“恒慨”、“蓼绥”、“羞绎”、“纷母”都是存在于当时实际语言中的复音词。由于扬雄记录的是当时的实际口语，而当时又没有一套记录语言的符号，于是就只好把汉字当作标音符号来使用。因此在《方言》中所用的字，除了一部分因为意义有关而沿用字书已有的字之外，③很多都是音同或音近而假借的字。如“寇、剑、弩，大也。”“寇、剑、弩”三个字原来都没有“大”的意思，扬雄只是把它作为标音符号来使用。又如“蠲，东齐谓之羊。”郭璞注说：“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蠲。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由郭璞的这段话可以推知东齐人“蠲”的声音跟“羊”的声音相同或相近，所以用“羊”去标音，而没有注意到这实际上是各地读音不同的同一个词，所以郭璞才说“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如果没有同音字可以假借的时候，就另造新字，如“掩”训爱，“棱”训哀，“𡗗”训好之类。他造这些字是用来标注实际语言中的词，因而就一定要考虑到词语的声音特点，由此我们可以推知